

农村社会流动进阶与农村教育功用变演

彭拥军

[摘要]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流动由不受人待见的“盲流”逐步演变成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洪流,农村教育的“去农化”功能空前凸显。随着农村青壮年倾巢而出式的社会流动出现,如何实现农村社会流动者从体力携带者向知识、技能携带者的智力流动转向,如何从单纯的流失性流动向流出与回流平衡转向就成为新的社会课题,它也为农村教育实现新的功能定位与功能转向提供了现实挑战和想象空间。农村教育通过促进社会流动而呈现的“去农化”功能经历了从潜在功能转向显性功能的变演后,越来越需要在“去农化”功能与培养农村新型建设者的“为农化”功能之间进行合理取舍,从而成为农村智力输出与智力回流的均衡器。

[关键词] 农村社会流动 智力流动 教育功能

在城市人口生育控制比农村实际上更严的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2011年末,中国大陆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城镇人口超过乡村人口(乡村人口数65656万人,城镇人口数69079万人)的情况,人口城镇化水平^①超过了50%。^②对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合理解释显然不是城镇人口自然增长速度优于农村的结果,而是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的产物。如何提升农村人口流动质量,既是我国人口城镇化必须日益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实现全民共创、全民共享现代化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要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了解农村人口流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大规模农村社会流动的滥觞与教育的功能困境

自改革开放以来,输出型农村社会流动逐步由个别人的“盲目流动”演变,成为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社会洪流,农村社会流动逐步演化为人们广为关注的公共事件,大规模农村社会流动隐含着农村体力和智力的大量输出。^③可以肯定,农村人口向城市和非农行业的社会流动,以及农村结构性升级是我国成功实现现代化不可避免的社会过程。在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

的成功转移与现代化发展过程相伴而生。就我国而言,农村社会流动无论在认识层面还是行动层面,仍然处在摸索过程当中。

从认识层面看,我国对农村流动人口(这里指的是制度外或体制外的农村流动人口,区别于大中专学生等通过制度性筛选进入非农人口行列的、以“农转非”为外显特征的农村流动人口)先后用“盲流”、“暂住人口”、“进城务工人员”、“农村流动人口”、“剩余劳动力”、“富余劳动力”和“农民工”等词语来指称。这些不同叫法实际上无声地说明了这个群体是介于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它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从未将农民工视为理所当然的新移民。^④当然,这些用语变化本身也是社会变迁或社会发展变化的反映或缩影。尽管这些变化的说法呈现了进步意味,但它们实际上仍然还只是把社会流动过程中的农村人口当成体力劳动者,对他们身上已有的或者潜藏的知识、技能以及智慧则有所忽视。^⑤这也意味着,人们对教育提升农村人口社会流动能力等品质的作用缺乏应有的关注和认识,或者说,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没有得到普遍认知。

从行动层面看,早期的农村社会流动主要是单向输出型,即农村单纯的体力和智力输出或流失(尽管农村人口心甘情愿甚至以此为荣)。这种社会流动的大规模发生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令人关注的大事有着内在关系,或者其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重要事件。具体而言,诱发和促成输出型农村社会流动的主要力量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的不均衡发展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并且为农村社会流动提供了外围条件和外部要求。与城市发展相比,农村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不同地区的发展速度不平衡,农户之间的收入增长不平衡。农村人口到城市和相对发达地区寻找致富机会的愿望强烈。第二个方面是农业科学技术的不断推广和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等一系列制度性创新,不但解决了农产品短缺问题,还增加和丰富了商品粮供给,从而为农村释放出大量劳动力并形成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劳动力蓄水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三个方面是体制性力量。随着一系列体制性改革的逐步推进,造成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僵硬分割的制度壁垒逐步松动,从制度层面上适应并推动农村社会流动逐步从个别现象演变成成为社会公共景观。

在城乡非均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格局下,一方面,农业和农村自身对知识吸纳能力的增长不明显;另一方面,“农村教育”^⑥实际上并不着眼于为农村培养人而是培养离开农村的人。尽管农村教育最初只是让部分考上大中专的农村孩子制度性地离开农业和农村,但教育实实在在帮助农村人实现了向上社会流动,并使“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被农村人不加怀疑地理解为“知识改善命运”的行动宣言。然而,随着农村社会流动的加速,受过一定教育的农村青壮年倾巢而出式地流出农业和农村,教育对农村社会流动的动员作用发生悄然而深刻的变化。如果农村教育仍然仅仅是去农化的,如何培养农村的新型建设者、把农村建设成与城市媲美的地方,都将成为我国现代化尤其是农村和农业现代化无法回避的矛盾性问题;如果我们仍然只是把农村的流动人口仅仅视为出卖体力的劳动者,而忽视了他们的智力和智力开发价值,必然影响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

毋庸讳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农村社会流动应该包含的智力意味会越来越浓。这主要与以下四方面的变化有关:一是产业间的智力转移。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造成农业就业人口数量和占

比双降,农村产业结构的非农成份增加。二是农村人口份额下降和农村人口市民化。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以及由一个农村区域向另一个农村区域转移,前者容易直接导致农民市民化,后者可能因资源在农村某个区域集中而产生新城镇并导致农民市民化,两者都会降低农村人口比重。三是农村社会流动从社会知识技能构成的底层逐步向中上层提升。最初的农村社会流动呈现出选择性较弱的特点或者缺陷,农村社会流动者在主动和被动之间只是改变着城市苦、脏、累行业的劳动力供给局面,填补或形成城市社会的新底层,但新一代农民工在逐步改变这种局面。四是农村社会流动产生社会阶层分化并形成新的消费群,这些新消费群的出现促进了城市商业、运输业、旅游业、文化、教育、卫生等产业发展。简而言之,庞大的农村社会流动满足了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农村社会流动向智力流动的转化则促使中国经济由工人廉价优势形成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使提升产品的知识和技术优势、真正实现社会产业结构的结构性升级成为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种背景下,农村教育需要打破原有功能定位以满足社会发展提出的新需求。

二、向农村智力流动的转向与教育新功能的期待

农村社会流动向智力流动转向,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又是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继续发展的重要动因。事实上,在共享发展过程中成长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正在呈现并将进一步加大与第一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阅历、进城动机等方面都很不相同,经历了城市工作和生活洗礼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和城市的认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对家乡的认同越来越淡漠;另一方面还没有真正确立起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因此他们进入了社会认同丧失和重构的艰难阶段,有可能成为一群没有认同或认同内卷化了的无“根”漂泊者。^⑦如何使新生代农民工变成重要的智力携带者,真正实现从一般性社会流动向智力流动转化,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可以肯定,如果仅仅把农村社会流动者,理解为城镇所需要的体力供给者,忽视这些劳动者身上蕴含的知识与技能,我们就很难把农村流动人口当做城市新市民来对待。如果对农村社会流动从智力流动的高度来重新思考,则意味着我们在开发和提升农村人口的知识、技能方面还有很大努力空间,也隐含着农村

人口大量入城不仅是农村青壮年人口的流失,也是农村智力流失甚至被剥夺。如果我们不尽快谋求农村智力输出与智力回流的合理平衡,农村现代化可能就要遭遇阻碍。简而言之,从智力流动视角看,农村流动人口不仅仅依靠体力获得生存机会,他们也越来越需要利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和智慧获取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因此,如何实施适切性教育^⑨来促进他们在知识、技能和智慧方面的开发和提升,将是一个越来越值得人们好好思考的问题。

如何尽快改变农村体力和智力单纯流失的状况,实现农村人口在体力和智力流出与回流之间的合理平衡,真正使新农村建设从鼓舞人心的口号转变为切实有力、深入持久的行动,我们不仅有必要在制度层面更好地完善新农村建设的种种设想,同样也需要从教育与社会互动角度,来促进农村由单纯的智力输导向必要的智力回流转向。

从事实层面看,农村体力和智力的流动,并没有使农村走出人口文化素质整体水平偏低、专业技能相对欠缺的境地,甚至加剧了农村智力相对较弱的状况。农村单纯的输出性智力流动,容易使新农村建设遭遇某些困难。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高素质的农村人口,需要绝对减少农民数量和不断提高农民从事现代农业的技能水平。要减少农民数量,除了采取合理生育政策控制农村人口机械增长外,另外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教育的提升作用使更多农业人口能够进城,并以此促进农村人口的结构改变;通过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实现结构性社会流动,促使进城的农村劳动者,能够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并提升就业层次,帮助他们最终实现身份改变和人格转换,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另外,要不断地提高农民从事现代农业的技能水平及农民的综合素质,改变他们的思想意识,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参与能力,需要对他们实施补偿性教育。^⑩对农民实施补偿性教育,既要提高他们的基本文化素质,更要着眼于促进农村产业的技术升级,促进农民向具有从事现代农业生产能力的新型农民转化,从而能够把农村建设成为与城市相媲美的地方,以便不断提高农村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吸附力,最终促使我国成为全民共创、全民共享文明发展成果的现代化国家。如何实现农村人口的合理智力流动,需要我们从多侧面和层面给予必要的关怀。

人力资源丰富而人才资源缺乏仍然是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之一。如何把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雄厚的智力资源,是关系农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然而,我们的教育体系一直只是通过终端选拔(高考恢复初期,主要是通过大中专招考制度,现在更多地体现为选拔部分农村人接受高等教育而实现命运的改善。鲁洁教授把这种教育选择称之为纵向社会选择的顶端化和横向选择的单一化^⑪)的教育选拔方式从农村筛选出少部分的人,使他们实现智力流动而进入城市,而淘汰下来的众多农村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教育实现对农村人才的掠夺性开发和利用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数量供给充裕的农村劳动力大军往往与较低的文化素质相伴随。

从教育视角看,成功流动的大中专生仍然是乡村文化的影子能人。通过接受教育而走出农村的大中专生(这是为行文方便而使用的说法,它实际上包括统分统配时期的中专生以及各个阶段的大学生、研究生)作为乡土社会中制度性流动的流出者,他们在生活地域和交往空间上都与原有乡土社会产生了一定隔膜,但他们的成功故事,仍然是乡村社会的传奇。他们的故事代代相传,鼓励出身农村的人发奋读书。尽管乡村社会中的教育成功者,在读书人矮小化的今天,其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弱化。但中国传承上千年的重教心理,仍然可以不断修复和抚平这些阴影,读书仍然是乡村社会认可的走向成功的重要途径。

如何使教育在农村智力输出与智力回流过程中都发挥应有的作用,已成为需要人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以高考为例,高考一直被视为国家的抡才大典,而不把高校选择合适的学生与学生进入合适的高校,作为高考更重要的教育使命来对待,它实际上就是把国家视为最大的集体,把国家利益视为首选利益。在这里,国家的名义仍然具有维护改革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强大力量。集体具有强大社会动员性和合法性与我国特有体制和治理格局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十分重要的举措就是国家垄断人们生存发展的基本资源,个人不依赖国家很难生存,这就成功营造了集体优于个人的社会情境。与之相伴随的一系列宣传,甚至“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类有良好语感也貌似科学、其实完全违背科学常识的说法,也曾“成功”地帮助营造了集体优于个人的思想舆论基础。随着这种集体与个人之间关系格局被合法化、凝固化,集体的名义就具有了特殊的社会动员力量。

值得指出的是,就如麦金太尔所言,正如正义和诚信这类规则,当且仅当有利于我们的长远利益时才被遵守,当它们不为我们的利益服务并且违反它们也不会有任何不利后果时,我们就违反它们,纵然如此,

我们的行动仍然不会被证明为正确的。^{[11]p55-56} 同样的,农村教育如果能够帮助农村人口在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能够促进农村社会流动走向智力流动,能够使智力流动从单纯流出向流出与回流平衡新格局转化,不管以什么名义实施,教育在农村智力流动中的功用都能真正凸现出来。

三、农村智力流动的合理向度与教育功能重塑

农村社会流动走向智力流动,实现从地理流动到文化移民,往往隐含以下三个特征:第一,流动富有明显的转型特征。农民工进城在外在形式上是地理意义上的流动,职业和身份的改变在制度上还没有得到切实认可,这种流动的智力输出性质基本上未得到认同;但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流动、农民工进城会起到大量制造社会新阶层的作用,这必然成为客观事实。第二,流动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尽管农村智力输出,仍然不可能抛弃血缘关系等旧的社会关系链条的影响,但适应和创生变得越来越重要。农村智力流动客观上会使更多农村出身的男女,抛弃因袭已久的行为模式,获得新知识、新技能和新观念,它必然促成更深层的文化移民。第三,流动过程仍然包含许多不和谐和不确定因素。尽管农村智力流动中的制度性流动者基本上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身份和地位转换,但那些没能真正跨越制度壁垒的农村社会流动者往往具有孤独感和相对剥夺感,^{[12]p13} 这会给农村智力流动在流量、流速与流向等方面带来动力与阻力并存的推拉效应,也使农村智力回流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农村发展需要多种智力回流

值得肯定的是,当今回流型农村社会流动开始大量出现。笔者为了在统计意义上反映农村社会流动者从业的地理空间,曾经把流动者分为省内流动和省外流动两者类型进行统计,发现在本省范围的流动者超过了到外省寻找工作机会的人。^{[12]p79} 如何实现智力回流,则还是一个期待关注的问题。

首先,需要“知识型”智力回流来提供农村持续发展的智力支持。中国 13 亿人口中有大约 9 亿农民,这 9 亿农民的智力资源形态可以概括为:隐性智力资源在数量上供大于求,表现为农村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充当着社会发展的劳动力蓄水池;显性智力资源的总体质量不高,因为农村人口大多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智力开发和提升严重不足,使显性智力资源供给难以满足农村当下和长远发展的需要。毋庸讳言,当前农民的综合素质难以满足农村社会的基层民主

建设、农村各种组织制度创新,乃至文化水平、法制意识提升等方面的需要。农村智力回流,除了及时补充农村教师、县乡干部等智力资源外,还需要新的“知识型”智力回流,让这些新智力充当农村进步与发展方面的指导者、管理者 and 建设者并承担起提高农民素质现实引领者的作用。

其次,需要“见识型”智力回流来帮助塑造先进农民群体。新一代现代农民应该是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农民。要培养现代农民,既需要提高其学历,比如努力普及 9 年义务教育并提升其质量;也需要有效增加农民的见识,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过社会流动经验的农民在城市打工期间,往往会有意无意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洗礼和熏陶,使他们逐步向具有城市文明素养、敢于冲破传统的现代人转化。据国家统计局《2011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数据显示,2011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5278 万人,比上年增长 1055 万人,增长 4.4%。其中,外出农民工 15863 万人,增加 528 万人,增长 3.4%。住户中外出农民工 12584 万人,比上年增长 320 万人,增长 2.6%;举家外出农民工 3279 万人,增加 208 万人,增长 6.8%。本地农民工 9415 万人,增加 527 万人,增长 5.9%。在农民工中,文盲占 1.5%,小学文化程度占 14.4%,初中文化程度占 61.1%,高中文化程度占 13.2%,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 9.8%。外出农民工和年轻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分别占 88.4%和 93.8%。外出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本地农民工,青年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最高。^[13]农村劳动力的智力回流,对推动农村的现代化、法制化、民主化、社会化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遗憾的是,上述相关研究也表明,青年农民工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要高于年长的农民工;与此相反,年长的农民工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比例要高于青年农民工,年龄层次越低,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也越低,这意味着青年农民工正逐渐丧失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这暗示着新一代农民工智力回流的可能性不大,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再次,需要“回乡创业型”智力回流帮助繁荣农村经济。这种智力回流的特点是回流者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并且在外闯荡过程中形成和彰显出较强的胆魄和能力。事实上,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规模持续扩大,2002 年为 9400 万,2003 年 1.1 亿,2004 年 1.2 亿,到 2011 年就已经超过了 2.5 亿。在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出的同时,也逐步出现了大量回乡创业者。据国家统计

局 2011 年的相关数据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在省内务工的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 52.9%,比上年上升 3.2 个百分点;在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 47.1%,比上年下降 3.2%,改变了多年来跨省外出农民工比重大于省内务工比重的格局^[4](该数据和笔者 2007 年的调查发现一致)。农民工回省、回乡工作和创业的人数在增加,回乡创业型智力回流从涓涓细流有可能发展成社会洪流。

(二)农村发展期待乡村文化能人的教育重塑

农村社会流动的直接动因是经济,但农村社会流动向智力流动的转化则需要乡土自身具有智力的孵化和吸附力,乡村需要有适应时代发展的文化能人。但现在,乡村的文化能人没有能够很好地发育成长,其原因:第一,制度化的文化能人已经在生活空间和作用空间上都远离了乡土,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断裂了与乡土社会的根,他们只能成为乡土文化中的影子能人;第二,在经济发展的特定时期,人们对当下生存性因素的关注优先于对未来的发展性因素的考虑,乡村经济能人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和制约了本土化文化能人的生产;第三,在一个尚处于经济膨胀时期的特殊年代,本土化的文化能人一时很难成为人们公认的能人,他们充其量还只是走在向乡村能人和制造乡村能人的路上。尽管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级民办教育的缔造者中,有一部分人成为了当地名人,也是当地能人。但他们能否真正促进农村人口转化成智力携带者而走出仅仅是体力承载者的困境,并且能够做出持久的贡献,则还是一个未知数。

作出以上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教育的发展速度和向度,往往受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等因素所处的阶段和水平制约,也与农村社会流动所处阶段与水平相关联。具体而言,农村社会流动向智力流动转化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市场支持系统因素。它主要包括人才或劳务引进市场、人才交流市场和专利技术市场等;二类是政策支持系统因素。它主要包括智力流动政策、人才使用政策、人才激励政策、人才保障政策、教育培训政策和人才流动迁移政策等;三类是城乡和工业推拉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收入水平与待遇高低、工作环境与条件、人际关系与民主氛围、晋升与学习机会、流动机会与自由程度、归属感与文化认同感等因素。

要实现农村社会流动向智力流动转化,从流失性流动向流出与回流平衡的智力流动转化,农村教育不但要帮助增强农村人口的流动能力,而且要帮助增强

农村智力回流的吸引力和吸附力。农村教育要成为沟通城乡、实现智力输出和回流平衡的均衡器。

注:

[1] 该人口数不是指户籍人口数,而是指常住人口数。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发布的一项有关中国城镇化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户籍城镇化率仍然非常低,非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 27.6%。参见中国青年报 2013-11-05 第 7 版,这一数据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的数据 27.7% 比较吻合。

[2] 国家统计局 2012 年 1 月 17 日公布的数据。

[3] 人们最初把农民自主社会流动称之为盲流,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后来又称之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寻出路的社会流动,进而把剩余劳动力的说法修正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这种说法其实还有一定问题。以往针对农村人口流动的描述往往只是把这种劳动者作为体力的供给者,忽视了这些劳动力的知识与技能。笔者使用智力流动这个概念来描述农村社会流动意在表明,农村社会流动越来越需要超越单纯的体力而包含更多知识和技能。

[4] 王春光.中国社会政策调整与农民工融入城市研究[J].探索与争鸣,2011(5).

[5] 彭拥军.现代教育与农村智力流动[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3,235.

[6] 有必要指出的是,农村教育其实是一个含义比较丰富或者模糊的概念,无论从“在农村”、“为农村”或“为农村人”的视角来理解农村教育都存在合理性,也存在解释盲区甚至误区,参见拙著《现代教育与农村智力流动》(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3)相关章节。

[7] 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特征、问题与对策[J].人口研究,2010(2).

[8] 所谓适切性教育是指教育服务要以受教育者的天赋差异和现实需要为出发点,以社会需要为导向,遵循知识掌握和知识发展的一般规律,追求人的主体性发展。

[9] 彭拥军等.农村成人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思维[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1).

[10] 鲁洁.论学校的选择功能[A].教育学文集·教育与社会发展[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11] 麦金太尔.追寻美德[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

[12] 国家统计局.2011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nodate_detail.jsp?chan-
nelid=75004&record=192](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nodate_detail.jsp?chan-nelid=75004&record=192).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
邮 编:411201
(责任编辑:董泽芳)